



冰冷的启动

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

[德] 格琳德·辛恩 汉斯-维尔纳·辛恩 著

晏扬 译



KALTSTART
volks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Hans-Werner Sinn
Gerlinde Sinn

上海三联书店

K
A
L
T
S
T
A
R
T

**Volks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冰冷的启动

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

[德] 格琳德·辛恩 汉斯-维尔纳·辛恩 著

晏扬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 / (德) 辛恩 (Sinn,G.) , (德) 辛恩 (Sinn,H.) 著 ; 晏扬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2.5
ISBN 978-7-5426-3765-9

I . ①冰… II . ①辛… ②辛… ③晏… III . ①德国问题 - 研究
IV . ① D75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3226 号

冰冷的启动：从国民经济视角看德国统一

著 者 / [德] 格琳德 · 辛恩 (Gerlinde Sinn)
汉斯 - 维尔纳 · 辛恩 (Hans-Werner Sinn)
译 者 / 晏 扬

策 划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黄 韬
特约编辑 / 李伟为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 × 1300 1/32
字 数 / 207 千字
印 张 / 11
书 号 / ISBN 978-7-5426-3765-9/F.620
定 价 / 45.00 元

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给我喝碗红汤吧！”……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我便给你喝汤。”以扫说：“我都快饿死了，这长子的名分还有什么用。”雅各说：“你对我起誓吧！”以扫依言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身走了。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创世记》第 25 章：27—34

导读：德国统一中的东德转型

——关于公平、效率、稳定与代价的反思

朱小平

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及国家政治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中央集权体制）向市场经济（及社会分权体制）转变的历史事件，即所谓的“转型”这一类历史事件，是在1989年后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中几乎同时发生的。^{〔1〕}这一历史事件是前所未有的、突发性的。因此，在“转型”已作为历史展现之时，乃至“转型”本身已显现出很高的社会成本与代价之时，对“转型”及如何“转型”的理解都是严重缺失的。“转型”是在没有任何理论先导与思想准备的状态下的历史突发事件。

〔1〕 当然，广义地说，“转型”与中国的常用语“改革”有相当大的重合性，但即便如此，仍不能武断地认定中国的“改革”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转型”。

转型作为一个历时的过程,肯定有其起点与终点。转型的起点,在“转型”所指的那个具体的国家,当然是由历史已经决定并通常有其具体的特征,而其终点则只能是一项社会选择,故从广义来讲,其终点是达致一项不同于转型前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契约。〔2〕

“社会契约”实际就是一项社会共识及其按此共识所建构的一套政治、经济的制度。任何社会契约所要达到的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公平、效率与稳定。在这里,“公平”与“稳定”的字面意义是直观的、自明的。“效率”则是指在所建构的制度安排下,国民经济就其要素禀赋而言能达到其生产可能性边界——至少理论上就是这样。在“效率”目标的意义下所涵盖的通常仅指经济活动(生产、交换、个人选择、公共政策)中的成本—收益(效用)比较的优化。

因此,就转型过程而言,通常(即经济学意义下)的“效率”这一术语并不能涵盖转型作为一个历史在其全过程中社会本身所承负的种种代价。所以,在思考转型问题时,就要求拓展一般社会契约论关于以上所指的三个目标,而使之成为这样的四个目标:公平、效率、稳定与(转型)代价。

其次,“公平”不仅要考虑一项新社会契约本身的公平性,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还有必须考虑历史公平的还原即所谓的“转型正义”。

〔2〕 中国有一些学者出于某些考虑,拒绝承认“转型”一定有“终点”。我个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逻辑上讲,一个不存在终点的转型只能认为是历史演化本身,因而就不再能称其为“转型”了。

可以将这四个目标(转型目标)构造成以下相互作用与关系的一个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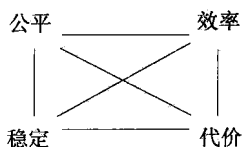


图 1

这幅图的意义在于表明各目标相互联系并在转型全历程中所具有的一种整体结构。每个目标都有与其他目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为了简化叙述,可以在某个具体事例中,只关注某一个目标(如公平)或只关注某两个目标(如公平与效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事实上(至少)有四个(主要)目标存在并相互关联,并且,最重要的还在于如何达致这四个主要目标与转型的路径相关。〔3〕一个简单的描述方法,就可以说成是在给定转型起点时,达到同样的公平、效率与稳定的社会契约(转型终点),则社会所承负的代价与转型所历经的路径相关。不同的路径将使社会承负不同的代价。于是,理论上存在于不同路径中选择最优(或次优)路径的可能性,以使社会的转型代价趋向极小。当然,这里特别指出的就是绝不能有意地孤立出四个目标中的某一个作为终极的而置其他目标于不顾,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这样一种做法,最终将会使社会承负它所不能承负之重的巨大代

〔3〕 在这四个目标之外当然还可以罗列出其他目标,如“自由化”等,但深入的探讨可以表明,这四个目标是最基本的。像“自由化”这一类目标可以由这四个目标导出。

价。因而,也存在这样的状况,即某些“劣”的路径及其自我依赖可以使转型最终无法达致社会共识所愿景的那个终点状态。

就“制度”在现代社会所指的意义讲,主要就是指一个政治社会的主权政府以法令、行政法规等形式颁布并(强制)实施的一系列规则。广义的政府——既包括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制度与常设组织在内的“政府”——是转型过程中极重要的角色。〔4〕因而,关于转型路径的选择,既由于各种历史的偶然性事实上细节上被决定,同时,也就表现为是一项政府的主动选择。就转型国家所重建的政府均为代议制政府而言,这是很自然的。关于“转型”的反思实则也就成为了关于这个政府对于转型路径的选择的分析与评价。

前苏联、东欧国家突发而至的转型,涉及十多个国家数亿民众,重塑了世界地缘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地图,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众多学者——不论是身在事件中的当事人亦或是“局外人”——纷纷加入到对转型问题的审视与反思之中,并且,由于转型并非是一个被预见的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必然导致各国(新)政府在转型初期大多是以一种被动的、急促的方式决定或安排着转型的具体路径,结果就是对于各国的转型历程一般地并非依据某种慎思下的最小代价的路径去演绎的。一些国家转型中呈现的巨大社会代价,就又促使了对于“转型”的更深

〔4〕当然,在前苏联、东欧各国发生的转型事件中,都以旧政府与政治体制解体、新政府重组和政治体制重建开始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政府”是转型过程的重要角色,就是指的“新政府”而言的。但理论上仍不能排除原政府自身成为转型的主要角色这样一种可能性。

入更细致的反思。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各学科(以经济学为主)已在“转型”这一命题下,形成了相当规模与深度的一个新的分支,如“转型经济学”。

比利时学者热若尔·罗兰(Gérard Roland)把转型分解为政治改革、自由化、稳定化、税收改革、私营企业建立与准入、私有化、企业重组、破产改革和银行改革等专项,在各专项的改革推进政策取向上至少可以有急进与渐进两项选择。由此可见,转型的路径选择有许多重政策组合,如果还要从转型路径的动态特性加以考虑,那么作为政策的序贯决策组合当然就更加丰富。因此,转型目标的社会共识一旦达成,则转型的全部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如何选取路径。从实际发生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来看,一个初步的总结就可以识别出以下图示表现的几个不同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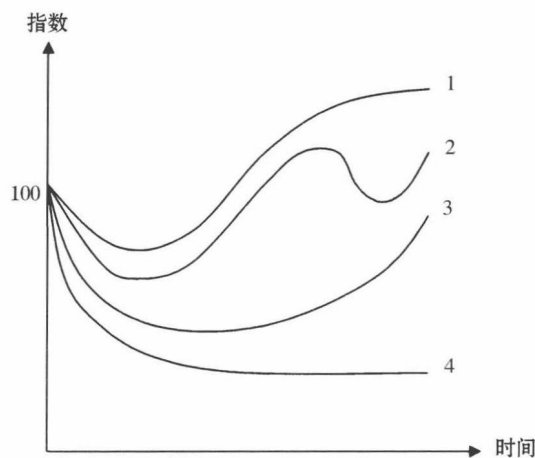


图 2

其中：

1. 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爱沙尼亚
2.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3. 拉脱维亚、立陶宛
4.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图 2 指数 100 取自各国转型开始前,考察的时间期限仅为转型开始后的 7 至 9 年。其中类型 1 表示的是初期产量下降后复苏的国家,类型 2 是初期产量下降复苏不稳定的国家,类型 3 是经历初期产量显著下降缓慢复苏的国家,类型 4 是经历持续多年的产量下降的国家。〔5〕

由此可见,转型各国起始状态的差异,可能最重要的是地理即与西方市场的贴近程度,除此而外,作为社会主体体制下的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史有很强的同质性,因而,造成各国转型历程的显著差异,可能主要来自于路径选择的不同。

由格琳德·辛恩、汉斯-维尔纳·辛恩合著的《冰冷的启动》一书(下称“本书”),就是对于原民主德国即东德转型的实践(路径)予以反思的一本专著。这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叙述、解释转型历史的书著,也不是一般的学院式地从逻辑上建构转型经济学(或政治学)的书籍,而是贴近东德转型历程实际给出的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与反思。

〔5〕 引自《转型与经济学》,热若尔·罗兰著,张中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 节的内容,文字与图形均有改动。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中,东德的转型具有其特殊性。从表面上看,也许可以将东德的转型看成是一个被西德“统一”,或更确切地说是被西德“吸收”、“接纳”的事件。如果把“吸收”、“接纳”看成是西德经济、社会“同化”掉了一个在规模上小得多但与它并不同质的部分(东德),〔6〕那么,“转型”能否用于表征东德自1989年11月9日开放两德边境(即俗称为“柏林墙倒塌”)以来的历史特征就有疑问了。事实上,在有些论述转型问题的文献中,基本上就把东德视为例外了。〔7〕但由于本文上面的论述,自1990年以来东德的历史仍应看成为一个典型的转型,并且,正由于这一转型历史有其特殊性,才使得如本书这样对此的反思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东德转型的特殊性显然就是其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之“转型”是被放置于“两德统一”这一政治事件中一并加以实施的。作为二战后基本上作为前苏联的占领区按苏联国家模式人为地设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原东德的经济崩溃、政治解体从内部来看,总的可以归结为它在两德自二战后事实存在的并行竞赛中的失败。原东德地区,在二战前(1936年)是原德国的相对发达地区,后来的西德地区(除西柏林外)的人均生产率,比东德地区要低约7%,人均GNP(1936)全德国是494,而西德地区是

〔6〕 按1989年的相关统计数字,东德的国土面积、人口仅是两德总面积的30%和总人口的21%,原东德的GDP(以市场价调整)仅是两德合并总量的15%,见本书第55页。

〔7〕 如《转型与经济学》【比】热若尔·罗兰著,在此书中仅于个别处提到东德,但却有更多处论及中国改革。如上文所述,我个人看法则恰为相反,至今不能说中国改革为转型,而东德则实实在在地完成了转型。

510, 苏占区(东德)则是 546。〔8〕但至 1990 年, 东德的劳动生产率低至西德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调查显示在制造业中, 东德的生产率仅及西德的六分之一。注意到二战前东德地区有着世界领先的汽车、飞机制造、精密工程、光学和化工生产基础, 有 DWK 汽车厂、容克斯(飞机)、蔡司(光学)等著名企业, 在 45 年后两德显现出如此大的反差, 就足以说明东德国家体制的总体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见本书第 23—24、30—31 页)。

本书作者对于东德体制崩溃的原因作了四方面的归纳。其一就是错误的激励, 即在公司及社会经济组织上没有反映资源、要素禀赋的真实稀缺性, 对管理不予重视等, 同时, 企业往往成了“社会俱乐部”;〔9〕其二是错误的制度, “制度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经济惯例以及进行计划调节和信息传播的机制”, 错误的制度对个人错误地界定了区域(因为它否定了明确的个人财产权), 无法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导向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三是缺乏技术诀窍, 没有诱导创新的市场激励机制; 其四就是扭曲的价格体系。〔10〕

〔8〕 见本书第 61—62 页。造成原全德国(德意志帝国)人均 GNP 数值低于东西德的原因是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含有“东部领土”即西里西亚、后波美拉尼亚与东普鲁士, 这部分地区人均 GNP 只有 229。但这部分领土在 1989 年后的两德统一时, 已正式放弃了。亦见下文说明。

〔9〕 “社会俱乐部”一语用中国的用语表述就是“企业办社会”。

〔10〕 见本书第 70—73 页。如果继续深入地分析原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问题, 那么, 在作者归纳的这四个原因下当然还可以更细致地去描述如科尔纳给予的“短缺”机制, 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等给予的关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可知性等等批判性论述, 但这些方面并非本书所关注的重点。但必须要指出, 由本书的附录一所列 1989 年时(转下页)

这样，在二战结束后的45年之际，与西德相比较，“东德是一个不幸的国家”，阴郁的城市，破败的工厂，“这个曾经富有的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是无能的。没有比高度有色的宣传和灰色的现实之间的对比更强烈的了”。同时，东德还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原东德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日本的3倍，尘埃则是100倍；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硫是西德的7倍，日本的30倍。甚至比东欧的匈牙利、波兰都高出1倍，大约有1000个区水太脏，三分之一的工业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5万个工业场所的土壤受到化学污染，个别地方存在核污染（第38—39页）。因此，东德的失败不仅是其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相比较的效率上的失败，在非市场机制的领域，如环境管理等公共政策治理方面，亦存在严重问题。

由于东、西两德接壤并存，东德的全面崩溃由两德边境的开放为标志，这即是东德转型的一个特殊性。相比较而言，前苏联、东欧的其他国家要么不存在突然开放边境问题，要么反而是要重新划分边境（如从前苏联中独立出来的那些国家）。边境的全面开放的意义不止于人员与货物自由流动的开始，它还意味着在政治体制层面上的两德合并能够以相对最快的速度予以

（接上页）东、西德在拥有消费品、住房等数据看，东德居民生活水平与西德相比，表面上差距并不太大，至少远远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如果我们迷信这一类数据，那么，东德崩溃就难以解释了，就会去乞灵某种阴谋论了。但若我们深入到东德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内部，就可以看到决定它最终崩溃的那些深层次因素。相对于这些因素而言，上面提及的那些通常用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消费数据反而是不重要的，反而倒成了对真实状况的遮蔽。

实施。至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条约》生效,德国内部政治层面的统一进程就已完成。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时间。〔11〕

像通常的情形一样,有许多偶发性,也有个人的推动作用(如时任西德总理的科尔大胆地提出迈向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等),都对两德统一如此这般的完成产生了影响。但是,当柏林墙倒塌时,两德统一就注定迟早会发生。当然这里仍然存在不同的路径选择问题。边境开放之始,甚至几乎没有人设想两德重新统一(第12页)!其后,东德新总理汉斯·莫德罗提出的政治方案是两德建立“条约共同体”,与此相应的就是东德政府竭力挽救其经济。西德总理随后迅即提出统一两德的建议(十点计划),随后两位总理商定两德建立“条约共同体”。但显然“共同体”的实质意义已变成了两德统一,并且,是在一个政治框架下的统一(第12—16页)。

作为一种最初想法,统一仍可以按两德作为两个国家,再结

〔11〕 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德国统一中还完成了两个事件进程,第一就是两德与四个二战后的占领国(苏、美、英与法国)的“2+4”谈判,并争得了四占领国对统一的支持(包括苏军撤出东德的承诺,当然,撤军费用由西德负担)。第二就是为实现统一的外部稳定而与波兰迅速签订了边境条约。德国为统一放弃了“东部领土”(即奥得—尼斯河以东,历史上曾归属过德国的领土)。这是德国为统一所付出的代价,但却为德国统一扫清了障碍并且稳定了统一后的德国与东部邻国的关系。虽然“东部领土”在文化传统上对于德意志民族是非常珍贵的,它包含有伊曼纽尔·康德的故乡等文化名城。这两个事件的完成花费了稍多的时间,所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得统一后的德国完整主权的时间,应在经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2+4”条约》(生效)并交给德国政府,即1991年3月15日(第50页)。

合两个国家的优势(“积极要素”)形成一个全新的德国来完成。显然这是一条既要求有复杂的谈判过程乃至统一后的长期试错实验的统一之路径。稍加思索即能明白,若按此路径完成统一,必使“统一”面临巨大的内、外部不确定性。因而事实完成的统一路径就只能采取东德完全放弃掉原有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完全接受西德制定的法律体系,同时,就有平等权利加入西德。因此,“统一”是从“两德统一”即是以第三方视角来讲述事件历史意义的用语,从西德的视角看,“统一”是“扩张”或称为“吸收”,从东德的视角看,“统一”是“加入”或称为“被接纳”(第16—17页)。事后来,这一条政治上统一的路径大概就是唯一可行的。当然,推动统一的力量,内、外部都存在,如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美国对于两德统一的积极支持,但最重要的还应是原东德民众的意愿。本书中写道“有一阵子人们似乎满足于被允许看西德电视,接着他们似乎满意于国内改革,以后他们希望与西德建立邦联。最后,当形势看似接近时,目标转向完全的统一”(第15—16页)。

这样,伴随着两德统一的进程,东德民众事实上完成了一个社会转型目标的共识,即东德社会转变成如西德一样(同质)的社会。旧的政治体制等上层建筑在统一进程中随即解体(1989年12月4日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全体辞职,1990年3月18日举行了第一次民主议会选举),并被新的体制所取代。

为加入西德即适应西德的制度,在统一进程中,东德已废止了一系列旧的经济法规并参照西德的相关法律颁布了一系列新

的经济法令。不像政治体制的变革那样简单,经济体系的调整涉及所有民众与他们的反应,也涉及历史遗留的问题,情况一定是复杂的。〔12〕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德国人明确地意识到“统一”进程中包含有东德经济的“转型”。〔13〕

“转型”被“统一”所包含,“统一”事实上成为东德“加入”西德,不仅意味着对东德的转型目标的社会共识得以迅速达致,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东德在转型起始点处的国民经济状况马上可以有一个参照系(西德)给予调整。因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建立的国民经济由于完全依据非市场价格的评价与核算体系,所以由此确定的一系列经济结构总量均是严重扭曲的,无法表示出市场价值体系意义下的实际状况。由于有这样的参照系的存在,所以,东德转型相比较其他没有这样的参照系存在的转型独立国家,自然有一些认知上的便利性。这个便利性绝不是单指“认知”而言的,更广义地还包括了转型中软的社会组织迅速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例如,在两德统一的进程中,西德的各研究院所等迅速地投入对东德的经济、社会

〔12〕 在作为政治的统一事件中,东德政府在1989年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紧锣密鼓地实施了一系列法律,重要的有1990年1月12日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1月25日引进职业选择自由,并允许开设(对个人与对外资)合资企业;3月1日颁布《第一托管法》,成立托管局;3月6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分离,并允许成立私营银行;3月7日国有企业转变为有限公司,并归还1972年以来没收的企业;6月22日取消价格管制;7月2日东德马克被兑换成西德马克,货币先行统一(第49—50页)。

〔13〕 1990年10月3日生效的“统一条约”中就含有“转型法”,即东德的国有经济转为私有化(第139—140页)。

的调研之中，并很快地给出了成果。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很难做到的。

由他们的工作，在以西德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将东德在转型起始点上的问题大致地归纳为“三个冗余”、环境污染和历史正义的还原。

三个冗余就是按市场价格体系、相关生产效率与社会结构的比较，在东德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各部门）中，劳动就业冗余 25%，且最大量的单项冗余就存在于难以说清的但又隶属于政府体系的“X 部门”，这样一些部门的就业人员总共占东德总就业人口的 4.2%，相比较，由于西德不存在这样的“X 部门”，故这些“X 部门”就业的东德人都是冗余的，换言之，在转型中他们将失业（第 49—50 页）。

第二项冗余就是账面资本存量的（虚值）冗余。按东德资本存量的官方价值及按 1989 年两德马克汇率 1:1 计，东德有资产存量为 17500 亿西德马克。但若按资本的陈旧程度与国际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生产率要求来实际核算，那么二分之一以上的资本存量甚至是三分之二左右的资本存量只能勾销掉。也就是说东德官方账面资本存量的实际市场价值大约仅值三分之一（或稍多一些）。这里还没有计入要对 5 万处东德遭污染的场地给予清理修复的巨大损失（第 53、123 页）。这个实情，充分表明了东德社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那种外部无效率即“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宿命！这个实情也表明了东德经济的转型与恢复是需要给予大量外来投资的，而如果东德真有账面价值的那么多资本，东德经济只需逐步调整到适应市场机制就行了，用